

从冯桂芬到郑观应

——洋务思想家试析

雷
颐

在中国近代史的行程上深嵌着洋务运动的足印，但它如此杂沓纷乱，以至人们今天仍热烈地探讨、仔细地辨别着它的行进方向。的确，认清这三十年的里程，对理解整个中国近代历程是极为重要的。

社会思想应是社会物质运动的反映。因此，对这个时期所产生的洋务思想（即通常被称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认识洋务运动。

一

洋务运动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清楚的问题。

兴办洋务的直接原因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些首当其冲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参与对外交涉的官僚，较现实地感觉到了世界的变化，不得不承认西方“船坚炮利”的优越，并希冀藉此维持、加强摇摇欲坠的腐朽的封建统治。所以，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作为其思想纲领。

无独有偶，日本明治维新时提出的口号是“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和魂洋才”。这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出一辙。与其说这是偶然的巧合，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新事物刚刚出现时，人们往往习惯于用旧的方式来理解它，希望把它容纳在旧框架之内。这样，受时代和阶级的限定，以维持、加强旧的统治为目的的洋务派就更不可能认识到船坚炮利，机器制造与封建制度的矛盾了。他们相信这些新东西仍能纳入旧的封建框架中

去。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说是洋务运动的本质特征。

难道对外妥协投降不是洋务运动的本质特征吗？

不是。因为洋务运动是个极其复杂的运动，参加洋务活动的人员非常庞杂，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态度、措施是各不相同的。左宗棠、刘铭传、张树声等人的爱国思想就较突出，其洋务企业的对外抵制性就较明显。即便是一贯主张委屈求和的李鸿章，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也未尝不希望“从此中国轮船畅行，……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①。所以，尽管洋务派中不乏对外妥协投降者，但对外妥协投降却不是必然与洋务派联在一起的。

同样，对待发展工商的态度也不是洋务运动的本质特征。刘铭传就认为“外洋以商为国，自强实在经商”，主张“举凡丝茶纺织垦矿制造诸大端”招集股商，允许“商自经理，官为保护”，政府“妥议保商防损章程，银钱出入商自主持”^②！郭嵩焘也上奏道：“窃谓造船、制器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③。陶模、胡燏棻也都上疏要求“开民厂”，“劝立公司”，“当与地争利，勿与民争利，当栽培工商以敌洋货而杜漏卮，勿搜括税厘以病民而自病”^④。能据此说他们不是洋务派么？

可见，在对待外国侵略、发展工商的态度上，洋务派是因人而异的。而时代和阶级却规定了他们的本质特征必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不论他们内部如何派系林立，个人气质有多大差异，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见解如何迥异，但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却是共同的。

如果说洋务运动发轫时“中体西用”的口号主要是针对顽固派的话，那么在戊戌时期它则阻碍着维新思潮的发展。它是一把双刃剑，遭到两方面的反对。顽固派与维新派分别从不同的方向

反对这个纲领。而坚持这个纲领的，就是洋务派。所以，它可作为衡量是否洋务派的标准。

现在，我们可用这个标准来检验从冯桂芬到郑观应这些被称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家了。

二

机器制造，声光电化等科学技术是威临中国的第一道近代文化之光。尽管当时的人们并不能立即明白它的全部含意，但一些开明而敏锐的人们仍尽其所能地理解它。

主持上海“中外会防局”，勾结串通中外反动势力共同镇压太平军的冯桂芬，对西方船坚炮利的感受自然更深。所以，他较先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⑤作为富强之道。他同时痛切感到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但“四者道在反求，惟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耳！此无待于夷者也”^⑥。只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对旧制度作部分修整，中国就能报仇雪耻，“复本有之强”成为第一大国。

尽管洋务运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但还是遭到顽固派“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的严厉呵责。对此，薛福成回答说：“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⑦他辩解道：“自有天地以来，所以纶于不敝者，道与器二者而已。”“而道之所寓者器也。”“道之中未尝无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⑧由于中国人重于道，西方人精于器，所以“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⑨中国的三纲五常、政教礼义是西方远远不及的，故“为今之计，莫若勤修政教，而辅之以自强之术，其要在夺彼所长，益吾之短，并审彼所短，用吾之长。”^⑩这种思想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抽象的

“道”寓于具体的“器”，无论“器”怎样变化无穷，“道”则永恒不变。

王韬亦如此写道：“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儒道也，亦人道也。”^⑭“人类不变，其道不变。”^⑮所以“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⑯他认为“器”是“道”的物质载体，故“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⑰他以为各种“器”所负载的根本之“道”是同一的、不变的，而“道”正是通过“器”的变化而使自身以不变应万变。

郑观应也向人们说：“中，体也，本也，所谓不易者，圣之经也。”^⑱“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⑲学习西方是“礼失求诸野”，是“由博返约”。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是“博”，中国的孔孟之道是“一语足以包性命之原”的“约”^⑳。他甚至主张要象牧师布道那样宣讲传统之道，要设立公所，“按期宣讲，听讲者授以餐”，“所讲以圣谕要言为主，而以孔孟之道，程朱之学旁通曲畅，务求有当于人心。”^㉑这样，百姓就能“改恶从善”，“永无犯上作乱之萌，万邦亦一道同风，咸知学圣尊王之义。”^㉒“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㉓由于这是郑观应的主导思想，所以《盛世危言》出版后受到许多洋务官僚的高度评赞。

陈炽的思想也是“始以自强，终以圣道”^㉔。他看到“商埠海疆，人情浮动”，焦虑地要求“急建书院，广储经籍，延聘师儒，以正人心，以维风俗”^㉕。他在为《盛世危言》作的序中写道：“既生孔子以正人心，达天道矣”，“他日我孔子之教，将大行于西”。“我恶西人，我思古道，礼失求野，择善而从，以渐复我虞、夏、商、周之盛轨。”^㉖

马建忠、陈虬也认为孔孟之道是“本体”，科学技术不出“六艺之外”，根诸“中学”。总之，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面

对突如其来的陌生事物，这些理论家们力图用传统的哲学来理解这种变化，以陈旧的道器观念来解释新的事物，为古老文明在新挑战面前的生存、调整、发展寻找科学的根据。时代未能给他们提供新的思想武器，他们还认识不到，机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的凝聚。机器所负载的，不但不是中国传统之道，恰恰相反，它是颠覆传统之道的物质力量，它将带来一个新的世界。而这些理论家们依然以为，在千变万化的表象之下，有着亘古不变的“道”。他们认为，道固然寓于器，但却从根本上决定器。器的功能只是负载、体现道。中国羸弱的原因是由于器的功能受到破坏，因此，只需向西方学其“器艺”，以更好地负载、体现中国的根本之“道”。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必然成为他们思想的基础。

在这种道器观的基础之上，他们根据中国传统的有机循环历史观豁达地认为列强的侵入正是“六合将混为一”，“书同文，车同轨”，人类大同的“天假之机”。

中国古代哲学的特征之一是不重视精致的经验分析与缜密的逻辑推理，而强调从整体上直观把握自然与人事。虽然带有某种神秘的气息，但又有着朴素的辩证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与人类历史的运动规律是统一的。儒家认为“日中则昃，日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无往不复，天地际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道家也认为“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纭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道无终始”，“消息盈虚，终则有始”。人们从“月有阴晴圆缺”联想到“人有悲欢离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成为“话说天下大事”的定律……。在新思想传入之前，洋务思想家也不可能偏离这种“天人感应”的历史循环论。

冯桂芬认为：“今诸夷互市，聚于中土，适有此和好无事之间隙，殆天与我以自强之时也”^⑨。郑观应预言：“五方俱入中

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强致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观而无难矣。”^⑤陈炽写道：“西人之通中国也，天为之也，天与中国以复古之机，维新之治，大一统之端倪也。”^⑥薛福成也认为“世界日开，其机自外国动之，其局当自中土结之，……其效即不在今日，亦当见诸千百年后也。”^⑦王韬也这样说道：“道无平而不陂，世无衰而不盛，屈屈必伸，否极必泰”，“凡今日之挟其所长以凌制我中国者，皆中国之所取法而资以混一土宇也。”“故谓六合将混而为一者，乃其机已形，其兆已著。”^⑧“既合地球之南朔东西而归于一统，亦必化天下诸教之异同而归于一源。”^⑨“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⑩。他充满信心地写道：“惟智者能以人事度天心，而即以远人益中国，庶几销兵气为日月之光，太和翔洽，瑞应骈臻，中外一体，遐迩禔福。”^⑪

后来的维新派代表康有为也理想着“车同轨，书同文”的大同世界。但康有为却是偏离了传统的历史循环论，汲取了西方进化论学说，用进化史观来论证他的“大同”社会的。二者的历史观是大不相同的。

也正是中国哲学中朴素的辩证因素使他们虽为这种深创巨痛而愤怒、忧虑，但并不绝望。他们能以充满深厚历史感的达观来看待这种巨变，认为这是中国复兴的开始，世界大同的必然进程。这不仅比那种对古老文明衰颓的感伤和叹息要高明，也比那种单纯的道义激愤和谴责要深刻。

但在他们的著述中，探讨得更多，也更引人注目的是具体的经济、政治措施。

冯桂芬强调的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并未明确提出发展工商的主张，其经济思想仍囿于传统的重农桑的旧说中。而以后的洋务思想家在这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他们提出要以“工商立国”，大力发展工商业，要求政府“保护商本”，要与外国“商

战”，以“夺回利权”。由于对他们这些思想已有较充分的研究，无需笔者在此多著笔墨了。恕赘言一句：前面已提到，一些洋务派官僚也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思想。

在政治方面，他们逐渐认识到封建专制政体的不足，激烈大胆地提出要仿效西方“设议院”。

王韬写道：“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②。因而称赞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度。郑观应、陈炽、陈虬等人也有较多论述。郑观应大声呼吁：“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③陈炽曾设想把议院制与乡官制结合起来，“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民气日舒，君威亦日振。”^④陈虬也认为“泰西富强之道，在有议院以通上下之情，而他皆所末”^⑤。

但王韬又说：“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⑥郑观应、陈炽、陈虬等都异口同声地说：“盖上下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天生民而立之君，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⑦“泰西议院之法，本古人悬鞬建铎，闾师党正之遗意”^⑧。设议院“但陈利害，不取文理”^⑨。他们所说的议院只是“通上下”的机关，而不是权力机构。他们仍是从中国传统的“通上下”“民贵君轻”这个角度来理解考虑的。如同他们没有认识到机器将破坏封建制度一样，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议会制与封建制是不相容的。相反，他们认为议会制是“三代遗风”，作为一种补充，会使封建制度更加完善。所以，王韬同时又认为“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是“本”，要“行宗法，而佐以屯田”，“厚宗植族”以“敦本”^⑩，就不足怪了。

但在当时，提出设议院无疑有着重要意义。这是洋务官僚们所未言或不敢言的，郭嵩焘曾多次赞扬西方“政教修明，具有本末”^⑪，“其官民相与讲求国政”^⑫。刘铭传也写道：“西国官

商一体，在下无不达之情，中国官商久睽，在下多难言之隐。”^③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西方“政教”的歆羡之情，但并未明确提出设议院。

以上分析表明，尽管他们的思想有时迸出激烈的火花，言洋务大员所未言，写洋务大员所未写——思想、言辞往往比实践、行动要急进，但其思想核心，本质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应当说，他们是洋务思想家。从他们的社会经历来看，产生这种思想并不足怪。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容闳、郑观应等都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都曾出入曾、李门下，为洋务运动立下汗马功劳。王韬曾因上书太平天国事躲避香港，但他与洋务官僚丁日昌交往甚深，为洋务运动出谋划策。正是这种社会经历使他们有产生洋务思想的可能。

三

为什么他们长期被认为是与洋务派不同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呢？

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曾对洋务运动有所批评，一些指责甚至十分尖锐。但应该看到，他们所批评指责的并不是这个运动本身，而是这个运动的不足。

王韬与郑观应是对洋务运动批评较多的二人。王韬曾说洋务运动“仅袭其皮毛，而即嚣然自以为足，又皆因循苟且，粉饰雍容，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④郑观应也曾激烈批评洋务运动中的仅重船坚炮利。但通观他们的著述，更多的指责还是针对顽固派的，而对洋务运动不乏夸赞之辞。王韬说：“夫洋务即时务，当今日而兴言时事，固孰有大于洋务者”^⑤。称赞洋务运动是中国的一线“转机”，认为轮船招商局的设立是“渐知以商力裕其利源，与西商并驾齐驱而潜夺其权”^⑥。“中国富强之机或基于此”^⑦。并希望能“剔弊兴利”，再进一步。

当一些洋务企业因亏损而被人攻击、要求停办时，郑观应则立即为之辩护：“计自闽、沪设厂仿造轮船以后，……日新月异，著有成功。无如制造愈多，经费愈絀，议者不察，动谓轮船可废，工厂可停。……先难后获，凡事皆然。今中国费千万之帑金，积十年之功业忽然中辍，长敌人之气，灭志士之心，失策莫甚于此。”^⑧他甚至为洋务派主办的海军辩白道：“不知有海军之时，尚不足以御外侮，若并此而无之，则重门洞开，内皆酣睡，有不启盗贼之心者乎？”“外侮之来，非海军不足以御之。”“自仿行西法以来，机械日精，虽训练未必认真，而已非从前可比”^⑨。总之，他们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这个运动，所以，“剔弊兴利”可说是他们对洋务运动的态度。

之所以认为他们是“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另一个原因更主要，也更引人深思。

怎么能把这批明显具有进步性的思想家同那些大多是镇压农民运动刽子手的洋务官僚相提并论呢？

但历史的复杂性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以至无法简单地用道德非道德、正义非正义、善良与邪恶，好与坏来理解衡量历史事件、人物。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正是国际资产阶级“按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的那个“世界”中的一部分，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彻底摧毁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实现工业化，成为近代中国面临的任务。但历史仿佛在开玩笑，使这光荣的任务有着不光荣的开端，把这伟大的使命交给不伟大的执行者。当然，如果中国历史能象西方那样从社会内部先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然后由资产阶级奋起领导法国式的大革命，再进行工业革命，该是多么理想，多么壮观！但十分遗憾，这只能是思想的现实，而不是历史的现实。我们应怎样看待这无情的历史事实呢？

恩格斯告诉我们，在历史研究中要着重探究历史人物动机背

后的动因。镇压农民起义只是洋务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而深藏在动机之下的，还有着未被时人意识到的动因，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必然要把大机器生产引入中国。这也说明为什么农民运动被镇压之后，洋务运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由军工而民用，由官办而官督商办，越办越大，又延续了三十年。看来，洋务派只是充当了大机器的媒介而已。机器一旦开动起来，就要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下去。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洋务运动的肇始者在把“心腹之患”的农民起义镇压下去时，无意中却将一个更剧烈，“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的革命家”——“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⑩引进中国，这与他们维持封建统治的初衷正好相反。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使人回味无穷。正是：

“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⑪

恩格斯曾批评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⑫。为什么我们还要按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以动机“是否镇压农民运动”来判断洋务运动、洋务派呢？让我们听从恩格斯的教诲，彻底摆脱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浓重影响吧！

当然，农民英雄的业绩不能不使我们激动不已，刽子手的罪行不能不激起我们极大的义愤，我们无法、也不应摒弃这强烈的爱和恨。马克思对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分析述评，为在历史研究中把鲜明的感情与冷静的理智结合起来作出了典范。请听，他这样说：“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

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③好，我们在以无比的义愤谴责洋务派的种种罪行，怀着真挚的感情讴歌农民运动的光辉时，也应象马克思那样豁朗、达观地说：那末，洋务派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引进新的生产力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四

从1861年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付梓到1893年郑观应《盛世危言》的刊行，是这一思想产生、发展、成熟的三十年，也是洋务运动从开创、发展，到破产的三十年。这样，逻辑与历史一致，思想进程与社会进程吻合。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便是产生洋务思想的社会物质原因。

在这三十年中，前所未有的大机器生产横空出世，魔术般地出现在中国社会。大机器生产在先，资产阶级产生在后，这是与西方不同的。这是个平庸的过渡时代，很少奋勇牺牲的英雄，也缺乏慷慨激昂的猛士，而是一些渺小的人物在不自觉地充当着历史的工具。

过渡的时代产生过渡的思想。承上启下，便是洋务思想的作用与意义。新旧矛盾，在这一思想体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冯桂芬到郑观应，洋务思想不断发展，已达到中国传统思想的边缘，但终未能跨越这道藩篱——这最后的关键一步，是维新派跨出的。

人们的认识水平是受条件限制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产生这种社会思想。所以，他们的意义不在于是否提供了正确的救国之道，拟定了可行的救时方案，而在于他们反映出时代的变化，为后来的变革提供了思想材料。

洋务运动的破产顿使洋务思想黯然失色。在新的历史阶段，

他们已无力成为时代的代言人。康梁的资产阶级维新理论顿时成为时代精神。但维新派正是在他们的基础之上而超越他们的。

注释：

- ①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第六册，6页。
- ②③ 刘铭传：《复陈津通铁路利害折》，《刘壮肃公奏议》，卷三。
- ③ 《郭嵩焘奏稿》，第341页。
- ④ 陶模：《培养人材疏》，胡燏棻：《变法自强疏》，《戊戌变法》，第二册。
- ⑤⑥②④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戊戌变法》，第一册。
- ⑦⑨ 薛福成：《变法》，《筹洋刍议》。
- ⑧②⑦ 薛福成：《代李伯相答彭孝廉书》，《庸庵文编》，卷二。
- ⑩ 薛福成：《赠陈主事序》，《庸庵文编》，卷二。
- ⑪⑬ 《郑观应集》，上册，第167页。
- ⑫②④ 王韬：《变法上》，《弢园文录外编》（以下简称《外编》）。
- ⑬④ 王韬：《原道》，《外编》。
- ⑮⑥⑦同⑩，第234，242、243页。
- ⑮⑨②同⑪，第490，491，276页。
- ② 宋育仁：《庸书序》。
- ② 陈炽：《学校》，《庸书》。
- ②⑤②⑥同⑪，第232，243，230页。
- ② 王韬：《六合将混为一》，《外编》。
- ③ 王韬：《天命不可妄干》，《外编》。
- ③ 王韬：《重民中》，《外编》。
- ③ 郑观应：《议院》，《盛世危言》，卷一。
- ④③ 陈炽：《议院》，《庸书》。
- ⑤ 陈虬：《上东抚张宫保书》，《治平通议》。
- ③ 王韬：《重民下》，《外编》。
- ③同⑪，第312页。
- ③ 陈虬：《开议院》，《治平通议》。
- ④ 王韬：《洋务下》，《敦本》，《外编》。
- ④ 郭嵩焘：《使西纪程》。
- ④ 郭嵩焘：《伦敦至李伯相》，《养知书屋文集》，第十一卷。
- ④⑤ 王韬：《治中》，《外编》。
- ④ 王韬：《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外编》。
- ④⑤同⑪，第91，762页。
- ⑤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页。
- ⑤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244页。